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講座 2014



交錯的東亞宗教

葛兆光

交錯的東亞宗教

葛兆光

Copyright ©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015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交錯的東亞宗教

作者：葛兆光

發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承印：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領航弱勢族群創業暨就業發展協會

定價：新臺幣 350 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一〇四年八月

GPN 1010401169

ISBN 978-986-04-5498-7 (平裝)

翻印須徵得本所同意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交錯的東亞宗教 / 葛兆光作。-- 臺北市：
中研院史語所，民 104.08
面； 公分
ISBN 978-986-04-5498-7(平裝)

1. 比較宗教學 2. 文集 3. 東亞

218.07

10401365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講座 2014

交錯的東亞宗教

葛兆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灣 臺北
中華民國一〇四年八月

自序

這本小書收錄的是 2014 年 10 月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講座」的三篇演講稿。前兩篇是正式演講，主題即本書書名：「交錯的東亞宗教」。在這個主題下，我從涉及東亞的佛教史和道教史中，各選了一例來討論。〈回應西潮〉這一講從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會上中國與日本的不同表現講起，討論日本佛教與中國佛教在當時席捲世界的西洋潮流衝擊下，由於各自國家政治、社會與文化背景的差異，形成了回應西潮和現代轉型的不同歷程，也導致了現代中日佛教的不同命運，其實，我也想借這一歷史現象，重新檢討東亞近代史上的「衝擊—反應」模式，對這個看似過時陳舊、卻仍有生命力的理論，作一些修訂與補充；〈橘枳之異〉這一講，則選擇了古代中國道教在古代東亞即朝鮮與日本的流傳問題，對宗教史上的所謂「影響」與「傳播」，尤其在「概念」、「立場」和「方法」方面進行了檢討，意在通過道教在東亞的流傳，說明宗教傳播史研究中，重要的是說明流傳過程中的變異，以凸顯受容一方文化的改造與詮釋力量。最後一篇〈納四裔入中華？〉，是作為第三場座談會的討論文本散發的，這是我最近特別關心的話題，即如何重新理解和解釋「中國」、「中華民族」。在這次座談會後，此文已經發表在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的《思想》雜誌 27 期，之所以要在「傅斯年講座」特設的座談會上討論，是因為我特別期待聽到臺灣學界的意見。

整個 2014 年春天和夏天，我都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原本訪問哈佛大學的意圖，是在那幾個月裡休息和放鬆，因為前些年太累了。但這幾個月中，大部分時間我卻不得不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裡，為這次「傅斯年講座」準備講稿。我記得，在與黃進興所長商量演講題目的時候，一開始我是想講〈在胡適的延長線上：有關禪宗史的研究方法〉以及〈預流的學問：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上半葉國際東方學研究之潮流〉這兩個題目的，因為我覺得，胡適與陳寅恪都與中研院尤其是史語所有關，但思前想後，覺得還是改講「交錯的東亞宗教」為好。事後再細細回想，之所以我會反覆思量並改變主題，而且要用那麼多時間來準備講稿，不外是三個原因——

首先，「傅斯年講座」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最重要的紀念性講座，傅斯年先生本來就是我尊敬的學術前輩，特別是當我受命創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時候，傅斯年先生創辦史語所的思路、原則和途徑，就更是我所追蹤和效法的榜樣，有機會擔任這一講座表達我對傅斯年先生的一點敬意，自然不能不用力用心。

第二，史語所是我很佩服的人文學術機構，自從傅斯年先生 1928 年創辦以來，一直是中國歷史研究的重鎮，所內高手雲集，各個領域都有專門研究者。在這樣的講壇上演講，正如當年錢鐘書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學演講〈詩可以怨〉時，一開始所說，在這種群賢畢至的場合演講，即使不是趙子龍一身是膽，也得有斗大的膽才行。因此，我不能不謹慎從事，認真準備。

第三，很長時間以來，我曾經涉獵過一些佛教史與道教史，雖然不算本色當行，也算略知一二，自己覺得，多年來也掌握了一些資訊和文獻，總覺得無論在佛教史還是道教史方面，都有一些值得發掘的缺漏環節和值得反思的研究方法。最近這些年來，我在中國大陸倡導「從周邊看中國」領域的研究，多少又關注一些歷史上東

亞諸國的互動，這次以「交錯的東亞宗教」為主題，其實就是想把「宗教史」和「東亞史」兩方面的知識與思考交匯在一起，以期引起學界對東亞各國之間宗教交流史的關心。我覺得，這一領域還有相當多的概念、立場和方法上的問題，值得學界深思。

演講結束，自覺還算不辱使命。此番臺北之行，要特別感謝歷史語言研究所，感謝黃進興院士的盛情邀請和親切接待。同時，也感謝王汎森、邢義田、杜正勝、林富士、李貞德等各位教授，感謝你們的傾聽、討論和主持。特別要感謝的，是余英時先生和張廣達先生，在寫這兩篇演講稿的時候，我曾去普林斯頓看望余先生，並把兩份講稿呈交余先生批評，得到了余先生的熱情鼓勵；張先生則是我大學時代修習中國史的老師，這次他特意前來，讓我在感激之外，還多少有些惴惴不安，自己感覺就像回到三十五年前北京大學的課堂，學生再一次靜候老師的測驗和考評。

是為序。

2014年12月30日于上海復旦光華樓

2014 年傅斯年講座

主講者：葛兆光 教授

主題——交錯的東亞宗教

第一講：回應西潮——1893 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會前後的日本佛教與中國佛教

日期：2014 年 10 月 14 日（週二）上午十時

第二講：橋枳之異——東亞道教交流史之概念、方法與立場的再思考

日期：2014 年 10 月 15 日（週三）上午十時

座談：納四裔入中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學界的「中華民族」論述

日期：2014 年 10 月 17 日（週五）上午十時

地點：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大樓 704 會議室

葛兆光，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曾任清華大學教授，現為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禪宗與中國文化》（1986）、《道教與中國文化》（1987）、《中國思想史》（兩卷本，1998 / 2000）、《增訂本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10 世紀》（1995 / 2006）、《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2011）、《想像異域》（2014）、《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2014）等。曾獲第一屆「中國圖書獎」（1988）、第一屆「長江讀書獎」（2000）、第一屆 Princeton Global Scholar（2009）、第三屆 Paju Book Award（韓國，2014）、第 26 屆「亞洲・太平洋」大獎（日本，2014）等。

目 次

自 序

i

第一講

- 回應西潮——1893 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會
前後的日本佛教與中國佛教 1

第二講

- 橋枳之異——東亞道教交流史之概念、
方法與立場的再思考 45

座 談

- 納「四裔」入「中華」？
——1920-1930 年代中國學界有關
「中國」與「中華民族」的論述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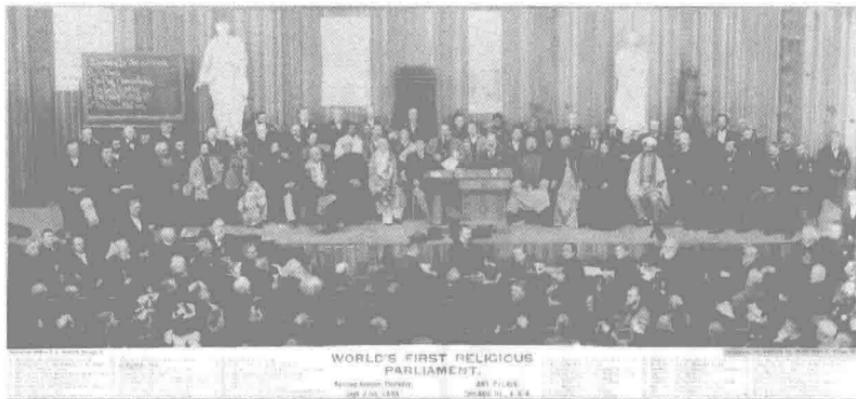
英文摘要

163

【第一講】

回應西潮——1893 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會前後的日本佛教與中國佛教

1893 年 9 月在美國芝加哥召開的「世界宗教大會」是一個重要的現代性事件，它衝擊著世界各種傳統宗教。日本佛教徒對於這一現代潮流早有準備，在會議上應對自如，說明日本佛教已經走出明治初年「祭政一致」和「神佛分離」造成的困境。但是，與日本不同，代表中國出席大會的主要是一些西洋各國在中國的傳教士，與會的唯一一個中國人彭光譽，則以帝國官員與儒家學者身份，傲慢地堅持儒家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對「宗教」與「現代」都表現出相當不屑。中國佛教不僅缺席大會，並且在那個時期，對現代潮流也缺乏回應，雖然 1895 年之後的中國士大夫轉手從日本學到佛教在現代的種種意義，因而刺激了晚清佛學復興，但中國寺院佛教對西潮的反應，仍然慢半拍甚至一拍，直到「廟產興學」直接威脅到佛教的生存，才開始了佛教振興與佛教改革運動。然而，正是由於中國佛教的反應遲緩，使後起的中國佛教不得不面對居士佛學的挑戰、現代政治和思潮的壓力以及日本佛教爭奪空間的三重壓力，使得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佛教舉步維艱。對比日本佛教與中國佛教的這一現代歷史過程，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有關東亞、宗教與歷史的問題，檢討有關這一領域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引言：從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會」說起

1893 年，是中國的光緒十九年、日本的明治二十六年。

這一年九月，由於美國芝加哥一個律師和社會活動家查爾斯·邦尼（Charles C. Bonney, 1831-1903）的提議，¹一些熱心人士包括長老會牧師約翰·亨利·巴羅斯（John Henry Barrows, 1847-1902）等人提出，芝加哥不僅要舉辦呈現物質文明的博覽會，而且也應當召開有關「人」和「心」的宗教會議。因此，在召開世界博覽會同時，也在密西根湖邊美術館裡，召開了一個「世界宗教大會」（World Parliament of Religions）。有關這個大會，除了美國方面留下由巴羅斯本人編輯的 *The 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 兩大冊，詳細記錄了會議的過程，刊載了各種論文和發言之外，²日本方面

¹ 他的名字在中國代表彭光譽筆下被譯作「邦迺」，並且說他是「襄理景教會事務」。彭光譽〈說教〉（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光緒二十二年〔1896〕同文館重印本），頁一。

² John Henry Barrows (edit): *The 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 vol. 1-2 (Chicago: The Parliament Publishing Company, 1893). 以下簡稱 Barrows 所編「英文報告書」。

也有不少記載。這是因為當時日本佛教、神道教、基督教代表都參與了這個會議，因此在日文世界中，有關這一大會的記載文獻，和有關這次大會對東亞宗教之影響的研究論著甚多，其中最為詳細的，是釋宗演的日記和八淵蟠龍的報告。³ 近二十幾年來，討論東亞各國宗教史和文化史的論著中，這次世界宗教大會也開始逐漸被提及，從 1990 年的 James Edward Ketelaar、2000 年以後的陳熙遠、村田雄二郎，一直到今年的 Judith Snodgrass，都有涉及這一方面的論著。⁴ 不過，James Edward Ketelaar 一書第四章〈巴別塔的再度召喚——東方佛教與 1893 年萬國宗教大會〉主要討論的是日本佛教徒在會上的情況與會後的反應；陳熙遠與村田雄二郎的文章，關心的重心是在「宗教」這一概念如何引入東亞；而 Judith Snodgrass 的論文，則是對日本佛教代表團在芝加哥大會上所持立場的敘述，特別討論了他們針對西方基督教與不平等條約的態度。但是，對於這一宗教會議給東亞（包括中國）宗教帶來的現代性衝擊，和東亞

³ 見釋宗演《萬國宗教大會一覽》（初版，東京：鴻盟社，1893），後收入《釋宗演全集》（東京：平凡社，1930）第 10 卷；八淵蟠龍《宗教大會報導》（東京：興教書院，1894）。

⁴ James Edward Ketelaar: *Of Heretics and Martyrs in Meiji Japan: Buddhism and Its Persec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此書的日文版為《邪教／殉教の明治——廢佛毀釋と近代佛教》，岡田正彥譯，ペリカン社，2006）；陳熙遠〈宗教——一個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關鍵詞〉，《新史學》（臺北）第 13 卷第 2 期（2002 年 12 月）；村田雄二郎〈東アジアの思想連環——清末中國の“宗教”概念受容をめぐって〉，三谷博編《東アジアの公論形成》（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233-237；Judith Snodgrass：〈シカゴ宗教會議のストラテジ——佛教と條約改正〉（日文本），末木文美士等編《交錯する近代佛教——ブツダの變貌》（京都：法藏館，2014），頁 149-178。

佛教（包括日本與中國）面對西潮時的不同反應及其後果，似乎至今學界討論得還不很充分。

一百二十年前舉辦的這次宗教大會，聚集了世界上各種宗教的信仰者。會議討論的內容，涵蓋了廣泛的領域，如神（或者佛）的性質、宗教團體組織、世界宗教經典，以及宗教與家族、科學、道德、社會等等關係問題，試圖通過不同宗教的交流，尋求共同的人類之愛，以達成世界人的宗教。⁵ 據說，在開幕式上響起了十聲鐘聲，這是象徵著世界十大宗教，即與會的儒教、道教、佛教、神道教、印度教、耆那教、拜火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和平共處。在長達十幾天的會議上，也不斷聽到有關四海同胞、世界和平、相互理解、求同存異的充滿世界主義色彩的言論。這使得一些來自歐美之外的宗教徒有一些感動，像日本的釋宗演就曾寫了一首詩，說「人有紅黃又黑白，道無北南與西東。不信請看天上月，清光透徹太虛空」，充滿了對世界信仰世界大同的憧憬。⁶

⁵ Barrows 所編英文報告書說（大意），這次大會的意義有十項：一是使世界上有歷史的偉大宗教的領袖與代表第一次聚於一堂；二是討論各種宗教共有的重要真理；三是推動具有博愛精神的各種宗教，求同存異，友好對話；四是由各個宗教與基督教各派別提出，什麼是重要的或獨特的真理；五是重新確認有神論的證據、人類不死的信仰，抵制宇宙唯物論的哲學；六是摩門、佛、儒、伊斯蘭以及基督教各種教會的領袖學者，陳述各宗教給予文學、藝術、產業、政治、家庭以及社會生活的影響；七是探索對於其他宗教的理解和寬容；八是向世界公佈各個主要國家準確和全面的宗教情況；九是發現並理解宗教對於現今各種重要問題如節制、勤勞、教育、貧富等問題的意義；十是討論如何使世界保持永久和平。見 Barrows 所編「英文報告書」上卷，頁 18；日本方面對這次會議目標的理解，可以參看日本學者編纂的《日本佛教渡米史》（東京：佛教出版局，1964）第二章〈萬國宗教大會とその後の大會〉。

⁶ 參看井上禪定《釋宗演傳》（京都：花園大學禪文化研究所，2000），頁 81。

但是，儘管世界宗教大會聲稱，並沒有一個宗教至高無上，而是在尋求世界各種宗教的共性，以達成人類兄弟之情誼。⁷ 不過，畢竟這是由基督教徒倡議和主持的大會，會上無論發言內容和演說安排，都是以歐美基督教為中心的，⁸ 無意中總會流露出西方基督教中心主義的味道，就像開幕式上的讚歌，就是來自基督教對神的讚頌——

你們要讚美，他在天上。(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

讚美聖父、聖子和聖靈。(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因此，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代表，儘管口頭上也認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想，但仍然頑強地凸顯各自的理念，⁹ 他們不斷強調自己的宗教主張，表達對基督教壟斷世界的不滿。比如，曾經遭到強烈噓聲的伊斯蘭代表 Mohammed A Russell Webb，就不顧聽眾的反應，以“*The Spirit of Islam*”為題，頑強地宣講其伊斯蘭理念，甚至捍衛穆斯林一夫多妻的合理性；¹⁰ 印度代表則對世界宗教大會一面宣傳基督教的博愛仁慈，一面無視會場附近著名的屠牛場，表示

⁷ 會議的倡議者查爾斯·邦尼在開幕式上說到，美國是自由國家，特別是宗教自由的國家。雖然物質文明有先後，但我們的精神文明卻要共享，雖然世界上宗教、人種、國土、風俗各異，但四海之內皆兄弟，不可不相互提攜，以求安心立命之信仰（大意）。

⁸ 在總共 194 篇會議宣讀的論文中，有 152 篇來自基督教立場，佛教 12 篇，猶太教 11 篇，印度教 8 篇，伊斯蘭教 2 篇，拜火教 2 篇，神道教 2 篇，儒教 2 篇，道教 1 篇，耆那教 1 篇，其他 1 篇。

⁹ 其實，就連基督教內部也並不完全一致，如英國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就不同意各種宗教平等地位的說法。

¹⁰ 對於這一論文和演講的質疑，參看 Barrows 所編「英文報告書」上卷，頁 127-128。又據釋宗演記載，當時聽眾不斷發出“no-no-no”的抗議聲，但是，他置若罔聞，從容地表達自己的觀念。

相當不解並加以諷刺；¹¹ 中國代表彭光譽則在大會上，委婉而堅決地表達了中國官方和儒家對宗教信仰的認知，暗貶各種宗教為「巫祝」，只承認儒家的神聖性；而日本佛教代表則在會上，強烈地表達了日本佛教的偉大理想和捍衛本土信仰的特殊意義，更不忘記批評作為基督教信仰國家的歐美列強對於日本的不平等態度和不平等條約。日本神道教的代表柴田禮一，則在會上以富士山為象徵，大力讚美神道「其志高尚，其心清冽，其形端正」。這給試圖營造世界宗教和睦氣氛的大會，帶來了一些不協調的色彩。¹²

那麼，東亞宗教的代表，又如何表達自己的信念、凸顯自己的立場呢？

一・「世界宗教大會」上的儒家與佛教：中國與日本之差異

綜合美國與日本兩方面的文獻記載，那一年，日本方面赴芝加哥參加世界宗教大會的有十幾位代表，除了代表日本基督教發言的同志社大學小崎弘道（Kozaki Horiuchi），¹³ 代表日本神道教發言的柴田禮一（Shibata Reichi）之外，¹⁴ 佛教徒有釋宗演（臨濟）、¹⁵

¹¹ 參看天岫接三《禪僧留學事始》（京都：花園大學禪文化研究所，1990），頁129。

¹² 土宜法龍在當時一封寫給友人的書信中，說到芝加哥大會上，不少基督教之外的宗教人士熱衷於針對基督教進行論辯，他甚至擔心這種能夠引起熱烈反響的論辯，會影響各個宗教正面表達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力度。見土宜法龍〈シカゴより（二）〉，《木母堂全集》（京都：六大新報社，1924），頁817。

¹³ 他的論文〈基督教在日本的現狀及其未來之展望〉，大要見於釋宗演《萬國宗教大會一覽》，載《釋宗演全集》第10卷，頁159-160。

¹⁴ 他的論文〈神道教〉（Shintoism），在英文報告書，上卷，頁451-455。

土宜法龍（真言）、¹⁶ 蘆津實全（天臺）、¹⁷ 八淵蟠龍（真宗）、¹⁸ 野口善四郎（真言宗），¹⁹ 以及先期在美的平井龍華（金三，臨濟

¹⁵ 釋宗演（Shaku Soyen, 1860-1919），臨濟宗僧人，鎌倉今北洪川門下。曾受福澤諭吉勸告去錫蘭留學，隨般若尊者修行，後參與島地默雷、土宜法龍、蘆津實全等人編《佛教各宗大意》。1893 年參加萬國宗教大會，大會上的論文為〈佛教之要旨以及因果法〉（The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as Taught by Buddha），見 Barrows 所編英文報告書，下卷，頁 829-831。另一發言〈以公理取代戰爭〉（Arbitration Instead of War），見 Barrows 所編英文報告書，下卷，頁 1285。明治三十八年，他曾再度赴美宣傳佛教，其門下弟子中最著名的就是後來被稱為「世界禪者」的鈴木大拙。

¹⁶ 土宜法龍（Toki Horiu, 1854-1923），高野山真言宗。參加 1893 年芝加哥萬國宗教大會，能講英文。回程中訪問歐洲，經由印度回國。著有《木母堂全集》等。他的報告題為〈佛教在日本〉（Buddhism in Japan），收在英文報告書，上卷，頁 543-552。

¹⁷ 蘆津實全（Ashizu Jitsuzen, 1850-1921），臨濟宗、天臺宗僧人。明治十三年（1880）三十歲時，當選天臺宗宗會議員，參與校訂縮刷大藏經，明治十五年，與同仁一道創辦明道協會，明治二十三年與島地默雷、釋宗演、土宜法龍一道編纂《佛教各宗大意》，並參加萬國宗教大會。明治三十年，從天臺轉為臨濟，策劃臨濟、黃檗、曹洞三宗合一，但沒有成功。明治三十六年任臨濟宗永源寺派的管長，著有《津梁錄》等。

¹⁸ 八淵蟠龍（Yatsubuchi Banryu, 1848-1926），九州熊本人，年輕時曾學漢學及唯識、俱舍，參加萬國宗教大會，回到日本後，撰寫〈佛教護國方案〉，宣揚在青年和軍隊中佈道的必要性，並且親自實踐，明治二十七年，與東本願寺的石川舜台氣味相投，倡以佛教促進日支提攜，實現東洋永久和平，在上海設立這一運動的據點，更聯絡梵蒂岡的教皇，但是，甲午戰爭之後，此計畫無疾而終。他在大會提交的論文，題為〈佛教〉（Buddhism），見 Barrows 所編英文報告書，上卷，頁 716-723。

¹⁹ 野口善四郎（Noguchi Zenshiro, 1869-1963?），論文曾在《新世界》（大阪）等上發表。其大會論文〈世界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World），見 Barrows 所編英文報告書，上卷，頁 440-443。

宗），²⁰ 和稍晚到達的川合芳次郎（日蓮宗）。²¹ 他們在芝加哥大會上表現得相當活躍，他們不僅有英文很好的平井金三，而且還特意帶了一名英文翻譯野村洋三。他們還特意攜帶若干日本佛教著作，在會上向與會者贈送，其中包括清沢滿之的《宗教哲學骸骨》、黑田真洞的《大乘佛教大意》、加藤正的《真宗問答》、赤松連城的《真宗大意略說》、西本願寺海外宣教會編的《真宗綱要》、松山松太郎的《四十二章經》、新居日薩的《日蓮宗大意》等等。²²

日本佛教早有準備。自從明治初年遭遇「祭政一致」和「神佛分離」的打擊之後，他們很早就開始在積極應對變局。他們一方面努力融入國際，學習歐美基督教的經驗，引入西方宗教研究方法，以「護國愛教」為名介入日本政治，以贏得宗教存在空間，一方面極力在世界尤其是東亞擴張，並且以「東方」之名義抵制基督教在

²⁰ 平井金三 (Hirai Kinza, 1859-1916)，京都臨濟宗妙心寺管長今川貞山（空華）之弟子，法名龍華。他精於英文，懷著改變不平等條約的理想，到美國到處演講，向民眾傳達日本思想，希望改變由於基督教傳教士形塑的日本觀與佛教觀。在世界宗教大會上，他的論文〈日本基督教的真正位置〉(The Real Position of Japan toward Christianity)，見 Barrows 所編英文報告書，上卷，頁 444-450；而後，他用英文又發表題為 Synthetic Religion 的發言，見 Barrows 所編英文報告書，下卷，頁 1286-1288。他一方面大力讚揚美國「黑船」與裴理將軍對於日本「開國」的刺激，一方面又批判美國基督教徒的日本傳道方式。據說，他還曾與美國國務卿談話，在談話中給美國以忠告，希望他們正確瞭解日本的宗教與國家。他著有《英和大辭典》、《宗教と政治》、《心靈の現象》、《三摩地》等。

²¹ 川合芳次郎 (Kawai Yoshigiro)，由於晚到，他沒有獲得在大會上的發言，只是提交論文，題目是 A Declaration of Faith and the Truth of Buddhism，收入英文報告書，下卷，頁 1309-1312。

²² 據土宜法龍的記載，僅 9 月 18 日一天，日本代表就贈送出《佛教大意》1600 冊，見前引《木母堂全集》，頁 818。